

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传承:乡村生态博物馆营建策略

——以黄山市休宁县木梨硐村为例

欧阳国辉¹, 杨春蕾²

(1. 长沙理工大学 建筑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2. 长沙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文章引入“生态博物馆”保护更新理念,以黄山市休宁县木梨硐山地传统村落为例,从地理特征、村落各层级空间、原生态资源、山村旅游业态发展四个方面分析木梨硐村“生态博物馆”营建的适宜性,归纳营建问题和困境,提出培养原住民“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意识、创建乡村“记忆中心”、挖掘适应现代需求的山村地域产业、完善法律法规、展开村落空间保护性设计更新实践等对策,以期为我国山地传统村落发展迈入良性循环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生态博物馆;徽州山地传统村落;木梨硐村;活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G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1)02-0102-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1.02.012

From Static Protection to Living Inheritance: The Strategy to Construct Rural Ecological Museum Based on Mulihong Village in Xiuning County, Huangshan City

OUYANG Guo-hui¹, YANG Chun-lei²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2. School of Design Art,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Eco-museum" protection and renewal. Taking traditional mountainous rural areas of Mulihong, Xiuning County, Huangshan City as an example, the suitability to construct "Eco-museum" there has been analyzed from four aspects, namely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village space of various layers, original ec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mountainous villages, and the problems and dilemmas of construction has also been summarized. Some countermeasures, such as cultivating "bottom-up"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indigenous residents, creating rural "memory center", exploring the mountainous village industry to meet modern needs, perfecting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carrying out the practice of space conservation design renewal, have been raised,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traditional mountainous villages in China to enter the virtuous circle.

Key words: eco-museum;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mountainous Huizhou; Mulihong Village; living protection

收稿日期:2021-02-13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XJK18BGD003);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2020JGYB167)

作者简介:欧阳国辉(1968—),男,湖南宁乡人,教授,主要从事公共建筑设计与理论、乡村保护与再生设计研究;杨春蕾(1995—),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设计。

一、引言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农业农村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而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要。目前,就学术界对我国传统村落保护更新模式的研究来看,可归纳为三大类:就地保护、异地搬迁和旅游开发。其中以旅游开发为导向带动村落经济发展是目前传统村落振兴的主流。然而,对于传统村落的开发,既要考虑人文、自然资源,又要顾及各方生存利益,往往难以在短期内两全其美。北京大学张成渝教授将传统资源遗产的保护程度划分为“严格的可持续”和“温和的可持续”,前者侧重保护并顺应发展,后者侧重经济开发,也承认保护的重要性^[1]。从长远来看,“严格的可持续”无疑对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但需要社会各界的恒久坚持和努力。新博物馆学理论所提出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恰恰验证了这种“严格的可持续”所带来的资源保护需求,其在我国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本文例述的木梨硐村作为徽州山地传统村落典例,在2016年被评为省级美丽乡村中心村。近些年,旅游导向在给村落带来收益的同时,因山地生态环境脆弱、空间承载力有限,利益追求日渐高于保护等问题也随之而来,现代化产业与地域融合所引发的矛盾愈来愈多,因此,如何在有效保护传承木梨硐村人文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促进村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为本研究的主体。笔者结合实地调研,结合村落自身现状,从山地村落适宜性角度,通过多方比较分析,为该村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运用营建“生态博物馆”理念来保护与活化木梨硐村人文风貌及自然资源。

二、相关研究述评

“生态博物馆”这一理念最初被西方国家用来应对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文化危机。1967—1975年,法国在生态博物馆之父乔治·亨利·

里维埃的指引下创建以人与环境相结合为主旨的地方公园模式,被视为生态博物馆的前身。在197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11届会议上,里维埃与雨果·戴瓦兰提出将“遗产与环境联系在一起”。1971—1973年,法国建立了世界首座生态博物馆——克勒索蒙特索矿区生态博物馆,营建目标为工业遗产地保护和创造地区居民自豪感,社区参与被高度重视^[2]。1980年1月,里维埃明确“生态博物馆”是一个进化的定义^[3]。戴瓦兰指出:“生态(社区)博物馆遗产教育的最重要意义是原居民懂得他们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保护和平衡利用他们的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传承和持久地丰富,基于他们的独特性和创造性的文化遗产。”^[4]目前,全球已有300多座生态博物馆分布在法国、意大利、日本、中国等地,其被运用于传统村落、工业遗址、历史文化街区等急需保护和发展的区域。

中国博物馆界在生态博物馆概念传入中国前,已有学者对环境科学、生态学和博物馆学展开关联研究。1986年开始,博物馆研究学者苏东海和安来顺在《中国博物馆》杂志陆续对西方早期生态博物馆进行介绍^[5]。1995年,以苏东海和挪威专家约翰·杰斯特龙为负责人的课题组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考察调研,中挪合作,诞生了中国首座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5]。1999—2005年,中挪双方继续展开贵州生态博物馆群项目的合作建设。自此,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导“六枝原则”被明确,由“资料信息中心”和“村落原状保护”构成的生态博物馆村落实践模式在我国沿用至今^[6]。目前,我国已先后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及东部发达地区建成50多座生态博物馆,最初以民族文化遗产为生态博物馆营建基础的模式逐渐演变为中国本土化的、更为意义广泛的生态博物馆。

综合来看,国内外关于生态博物馆的研究与实践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聚焦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工业遗址保护区、历史文化街区等,缺少针对山地类型传统村落的生态博物馆实践

研究,而山地传统村落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具有强烈地域性特征。同时,前期较为封闭的环境使得多数山地村落保存完整,原住民生活其中,村落呈活态性,极具研究价值。结合生态博物馆保护理念,本文重点探讨其对徽州山地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价值与实践策略。

三、木梨硐村“生态博物馆”营建的适宜性

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差异在于:传统博物馆=建筑+收藏+专家+观众;生态博物馆=地域+传统+记忆+居民^[7]。生态博物馆首先是将某个社区(群)或区域作为博物馆,包含人文和自然环境;其次是原住民自愿将本社区(群)或区域作为“博物馆”,愿意以“博物馆”方式生活^[7]。“博物馆”的持续性、永久性保护特征仍然存在,“原住民”被强调。生态博物馆所体现的理念与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的“特色保护类村庄”战略规划不谋而合,将被大众遗忘的乡村自然和人文要素纳入活化保护范围中,通过提升原住民本土文化认同感带动传统村落社会与经济的良性发展。木梨硐村“生态博物馆”营建的适宜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地理环境特征鲜明

木梨硐村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该自然村落始建于明万历十五年,坐落于山脊之上,现有居住户数为 59 户,共 208 人,村落总面积约 15 000 平方米,村庄南北长约 250 米,东西宽约 65 米。木梨硐村是典型的避世迁居型村落,生态环境绝佳,村落三面悬空,徽派民居建筑错落有致的自南向北分布排列,依山势呈阶梯状延伸而建,随地势分四级,这片身居高山之巔的古村落被誉为“黄山最美的高山村落”,作为古徽州海拔最高的小山村,因为地理位置独特而气候特征鲜明,全年 200 多天大雾,整个村庄常年浮于云海之上,加上满山水墨般的竹林,古徽风特色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村落各层级空间保留完整

木梨硐村落整体空间形态保留完整,部分明清时期的徽派民居保存完好,大多数院落和巷道空间至今仍为村民使用。由于高山地段的风力冲击较大,所以建筑只保留基本的马头墙,房檐上繁琐多样的徽派装饰被舍去,屋顶两侧勾起“排瓦”,极大程度降低了风阻,房屋布局一字排开,让大风穿堂而过,从而有效降低山风对建筑的破坏。竖向空间上,村庄共由四层台地构成,为节省空间,每层之间由整块青石板构成的台阶连接,村落道路狭窄却异常坚固。细节上,民居建筑以竹竿为排水材料的传统方式基本保留;公共空间的杉木架空走道(也作晒台)是村庄独有标志,已有百年历史,晒台长约 300 米,宽约 3.5 米,共使用直径在 20 厘米至 25 厘米的当地杉木材 1 800 根。山民就地取材构建村落空间,因地制宜寻找最适宜的山地居住方式,最大化合理利用空间的建造理念,充分展现出徽州山地传统村落聚居生活、抵御外来侵入者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朴素山民价值观,如图 1 至图 4 所示(注:本文所有图片,除图 5 源于张建平外,其他均源于杨春蕾)。



图 1 院落空间



图 2 巷道空间



图3 竖向空间



图4 杉木架空走道(晒秋台)

(三)原生态资源充沛

“生态博物馆”理念经本土化后以“保护文化遗产的原生性”为主要目标,木梨硐村作为典型徽派山地村落,历经百年沧桑,村落物质文化和产业生活早已与大山融为一体,这种独具特色的山民社会形态、村落空间构建、徽派山地建筑、民风民俗、传说故事等代表着徽州山地民居智慧的人文自然资源也同样值得我们以生态博物馆的功能和观念去守护。木梨硐村拥有得天独厚的山地自然环境和保存良好的徽派民居群,原生态资源丰富。在人文生活方面,四百多年来村民自给自足,在山上耕植、圈养牲畜;山村民风朴素,夜不闭户,村落特色产品皆取自大山。独具特色的徽州山民社会形态和富裕的物产资源令自然和文化遗存相互融合,富有原真性、整体性和活态性,具备营建为生态博物馆的适宜性和潜力,如图5、图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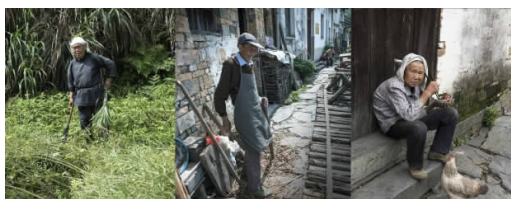


图5 原住民



图6 特色食品:芝麻米糍糕、高山菊花、腌肉

(四)山村旅游业态亟待新发展

木梨硐村目前采取的是旅游开发保护模式,外部矛盾少且原住民参与度高,具备村落活化基础,但传统的乡村旅游开发模式与山地传统村落本身存在诸多矛盾,山村旅游业态亟待新发展。首先,传统的乡村旅游开发往往关注物质层面而鲜少注重原住民精神层面,重心在于经济效益而忽略原住民常态生活,同时旅游开发囿于山村内部,该模式下的传统山村资金薄弱,易走向盲目。其次,乡村旅游开发是通过提升客源量拉动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的^[8],明显不适合空间使用已达到饱和状态的木梨硐山地村落,保护初心在利润获取过程中易被弱化。最后,旅游开发保护模式主要集中于“自上而下”的规划层面,缺少在实践中切实结合村落现状以及发现村落内生文化价值^[9],实际经营管理非专业化存在安全隐患,不利于村落长期发展。相较来说,“生态博物馆”是营建“特殊”的旅游景点,本质上仍具备“博物馆”以传播知识和社会教育为首要责任的特性,兼备多学科性、地域性、开阔性、协调性^[6],同时具备整体性、真实性、活态性、参与性的文化自然遗产保护原则^[10]。运营目标是让原住民和来访者主动参与,例如苏格兰斯塔芬生态博物馆由当地居民自立公共组织进行管理,居民参与定义和管理资源遗产,对地区未来发展提供建议。“生态博物馆”的长期目标是提高原住民的保护意识和利用现有资源扩展经济前景,以营造原住民长远就业机会而非短暂的经济获利^[11]。因此,从长远角度来说,营建生态博物馆是在满足原住民经济需求基础上结合地域给村落带来良性循环的有效方式。

四、木梨硐村“生态博物馆”营建的困境和挑战

(一) 现存的困境

山地传统村落往往因特殊地理环境与外部沟通不便,导致经济发展处于边缘,但也正是因为长期封闭的状态,使得大多数山地传统村落完整保留了昔日先民克服山地复杂自然条件而建立家园的生活状态,弥足珍贵。关于徽州山地传统村落的保护活化实践存在诸多难题,以木梨硐村为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地理环境险峻。徽州山区最为知名的传统村落以西递宏村为代表有近五十座,它们多位于黄山的余脉之上,海拔基本在 100 米至 200 米间,地势相较平缓且毗邻河流,除此之外,还有百余处海拔较高的山地村落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处于大山深处而游离于大众视线之外。海拔较高的山地村落地形地貌极为复杂,交通闭塞是限制这类村落发展的主要原因,由于和外部沟通不便,导致村落经济发展迟缓。笔者走访木梨硐村时,从省会合肥乘车到詹家山约 5 小时,还需在山道徒步 1 小时才可抵达。其中松珍盘山公路路段狭窄,山中多暴雨积水,小型塌方时常发生。村落大件物品完全由人力搬运上山,如此的交通条件极大地限制了原住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空间承载力有限。就村落空间组织来看,徽州山地传统村落在最初营建时为避世与防御考虑而选择地势较为隐蔽的山林,受地形限制,村落占地面积极小,承载和容纳人数能力薄弱。这与现代乡村旅游通过获取大量游客来带动消费的产业导向产生了巨大矛盾,不同于一般村落可较大限度向周边延伸生长,山地传统村落历经先辈百余年的开发营建,其承载量已达到最适宜居民生活的状态,空间也达到最大利用限度。如木梨硐村因自身公共空间余存有限,村民发挥智慧在竖向空间上建立层差,横向空间上在村庄外围山体高差边缘搭建晒秋

台,现也作为公共走道,其公共空间承载力早已达到饱和状态。

第三,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不平衡。生态文化资源方面,山地传统村落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但文化资源相较匮乏。以乌镇、宏村等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村落不仅有地理基础,也因千百年农、商、官的青睐,文化底蕴深厚且影响广泛,而处于高山深处的徽州山地村落长期游离于社会文化中心以外。因此,对于人文资源的开发难以模仿上述成功案例,仍需要根据村落自身打造新的文化发展思路。若仅仅想借助旅游观光改善村落,除了自身承载力有限外,竞争力不足而导致的发展局限性也会令村落停滞不前。

第四,人力资源匮乏、资本引入缺失。乡村振兴战略是“统筹城乡发展”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的升级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产业振兴,乡村人力资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农业现代化、农村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高素质人力资源的基础^[12]。大多山地传统村落可耕种面积少,产业发展机遇小,人才吸引力弱,人力资源匮乏。我国部分山地村落虽然已被评选为国家级传统村落,但财政资金只能满足村落的基础改造,山地村落的资本引入尤为欠缺,考虑到山村旅游的规模效应不足,大多商业资本不会展开投资。

因此,传统山村如果仅依靠旅游产业谋求发展,将会面临游客资源太少、旅游市场低端化等问题,从而引发一系列环境安全隐患。由于地理环境和自身资源价值,山村客源和知名度往往局限于省内或周边,吸引力较低,经济发展缓慢,山村同样长期面临如何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山地传统村落急需探索更为适宜本土的保护更新模式。

(二) 面临的挑战

“生态博物馆”作为西方文化自觉的发展产物,在我国必然要历经本土化改变才能适应国情。加拿大生态博物馆在原先强调居民参与和

挖掘区域共同记忆的基础上开设大众博物馆学课程(解释中心)以提高居民认知。美国社区生态博物馆借鉴此做法,居民组织成立信息中心,制定和实施培训计划。可见,各地生态博物馆都有自己的历史、特性和对策。相较而言,我国目前虽已建成50多座生态博物馆,且保护对象日渐多样化,但正如我国生态博物馆引入者苏东海先生所说:建一座理想的生态博物馆很难,而巩固它比建立它更难^[13]。对于木梨硐村来说,主要存在三大挑战。

第一,营建生态博物馆模式的主人公意识如何建立。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政府在多个建设层面都占主导地位,相较于西方生态博物馆由居民自发建设,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生态博物馆初期建设和运营只能依靠政府。山地传统村落原住民以留守老人居多,思想较为闭塞,对村落未来发展的主人公意识薄弱。木梨硐村目前注重旅游开发,部分中青年群体返乡经营民宿餐饮,但对生态博物馆没有概念。即使政府初期营建好村落生态博物馆,后期发展仍需要村民自主维护,若村民最初就无法理解和具备参与意识,生态博物馆最终也会沦为普通意义的旅游景点。生态博物馆重在原住民能够真实生活,参观人次和展示活动是次要的,真正被关注的是原住民怎样应用生态博物馆的思维方法,自主管理和保存自然文化遗产。这一切都是在原住民自身意识和行动跳出原有桎梏,发生扭转的前提下进行,此为山地传统村落营建生态博物馆的最大挑战。

第二,山村经济需求与“严格的可持续”如何平衡发展。我国山区经济大多不富裕,因此首要考虑经济需求。梭戛生态博物馆曾是贵州最贫困村寨之一,政府从物质上给予营建基础后,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改变。在营建初期无疑需要一定的经济保障、外界支持和原住民自发参与。基本物质条件满足后,山地传统村落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追求就得放一放,地域特征决定其一旦发展过度就可能走向毁灭。

这在许多商业气息极为浓郁的古村镇也有着相似的道理,虽不一定毁灭,但也会落入了“千村一面”的死胡同^[14]。日本曾经也出现过这种状况,因而建立生态博物馆协会,既是为了永久性、正式性的传承下去,也是为了监督和化解博物馆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冲突,防止生态博物馆变质。

第三,“游访者”如何同“原住民”融洽相处。首先,地理区位要求着水乡古镇单日上万次的游客量绝不能在山地村落出现。其次,游客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无疑会影响原住民正常生活,像木梨硐这样的云端村落,许多家庭平时只有老人居住,住户无力翻修住所,或是民居处在视野较差位置,没有能力接待游客。民宿旅游仅仅是带动了一部分人的富裕,却让许多未参与的原住民失去了原本宁静生活的权利,游访者和山地传统乡村的“关系”营建是生态博物馆要注意和思考的问题。“六枝原则”中指出,村民是其文化的主人,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15]。村落和游访者“相处”融洽应建立在文化自信、自觉、尊重之上,原住民以保护发展村落为自豪,游访者从学习体验的角度对待村落,村落才能长远健康发展。

五、木梨硐村“生态博物馆”营建的对策与建议

生态博物馆既是一种保护模式也是新型博物馆的分支,“严格的可持续”理念若要运用于山地传统村落并得到长远实践,除了培养原住民自治意识外还要提升专业化、博物馆化程度,营建和巩固缺一不可。本文针对山地传统村落“生态博物馆”的营建,以木梨硐村为例提出几点营建对策和建议。

(一)培养原住民“自下而上”文化自觉意识

山地传统村落原住民往往已经习惯“自上而下”的村落生活,多数山村总是“被旅游”而非原住民自觉发展,随着利益驱动,原住民的本土保护意识将逐渐被削弱。要想原住民态度从被

动变主动,行为从“自上而下”逐步转为“自下而上”,就必须激发村民对村落保护的积极态度,生态博物馆是一张异于普通旅游宣传的招牌,村落不是只能靠民宿、农家乐发展,从保护的路子走也能行得通,而且这是一条让村庄保持长久活力和健康发展的途径。同时,外界投入可侧重教育培训,鼓励原住民中青年群体了解营建价值并参与其中,鼓励学者到访研究以增强山民自信心等方式来提升原住民文化自觉及主人公意识,让原住民通俗理解何谓文化,意识到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政府可以赋予和培养村民一定的文化自决权,以调动村民参与生态博物馆营建的积极性。

(二)创建乡村“记忆中心”

生态博物馆除了帮助乡村展现一个从人、物到生活都保护完好的健康面貌外,也需要建立一个文化记忆载体。类似国外的“解释中心”,既帮助原住民与游访者理解生态博物馆,也作为村落的记录载体。在校戛生态博物馆项目中,贵州政府在村寨中建立资料信息中心,利用现代信息贮存手段将村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信息都汇总其中,物质和非物质的记忆载体都被收集。在这里,村民就是村落故事中的主人公。就像过去祠堂是家族的核心,“中心”可以作为适应现代社会凝聚全村寨的精神点。村民本身、村落物件都是记忆的输出者,只要原住民在,“记忆”就源源不断,游访者在这里了解当地“记忆”后,再通过村落生活的实际体验,体会到蕴含其中的道理和村落特色,文化自觉与文化尊重自此形成。

(三)挖掘适应现代需求的山村地域产业

生态博物馆营建的内容包括对村落产业发展的良性引导,山地传统村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因此不能局限于名人事迹、历史名胜等文化资源,山地村落应打造符合自身、适应现代需求的特色发展思路。例如,木梨硐村坐落于高山之脊,在保护的前提下,村落可尝试借助当地独特的气候、动植物、地质等丰富自然

资源吸引和鼓励相关学者来此考察研究,间接帮助村落健康发展。木梨硐村传统的农业种植活动也是村落“活”的体现。同时,木梨硐村作为黄山市十佳摄影点之一,目前仅在村落前山建有一个小型摄影台,建议系统组织各地摄影师,发展特定客源成立协会小组,借“影像”提升村落知名度,为生态博物馆营建添砖加瓦。

(四)完善法律法规,让山地传统村落保护有法可依

如今,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木梨硐村的基本生活需求已经满足,但日后的长期发展还需政府健全法律法规,严格实施监督责任。目前,我国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法律法规分割严重:村落规划建设、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归属国家住建部、国家文物部、文化部管理。山地传统村落往往汇集上述三种情况,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存在诸多漏洞。因此,针对不同地域的传统村落,需建立具有针对性的保护条例,遵守“有效保护、合理利用、适度开发、科学管理”的方针,强化“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生活延续性”的保护原则^[16]。

(五)展开村落空间保护性设计更新实践

生态博物馆在物质层面对村落进行保护的首要任务是改善空间。宏观层面,做好村落保护性规划,依托自身资源优势与特色,发展山地村落旅游产业,提高村民经济收入。在村落生态环境修复方面,创造生态宜居的、生活富裕的村落人居环境(如图7所示)。中观层面,修缮村落公共文化建筑及公共空间,激活“记忆”场所,合理规划行走路线,以点带线,以点带面,修复特色的祠堂、民居等历史建筑,修缮特色的“晒秋台”,保留和完善特色的摄影角,调动村落整体空间活力(如图8所示)。微观层面,对村落民居建筑艺术以及特色的砖雕、木雕等传统工艺进行数字化整理与现代转化设计,大力研发特色文创产品,在提高村民收入的同时扩大村落文化宣传。由此,完成木梨硐村这类山地传统村落的“生态博物馆”空间营建,使村落物

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真实的、完整的和原生性的保护和发展。



图7 设计方案:村落自然空间的修复与修补



图8 设计方案:村落人文空间的保护与更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我国未来促进乡村全面进步与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依据。山地村落数量在我国乡村中占比巨大,山地传统村落更是古民居智慧的集中体现,保护与发展极为迫切。生态博物馆是一把对原住民、政府和外界社会施加的责任锁,需要各方不遗余力地坚持监督和关注。正如苏东海先生针对我国贫穷山地传统村落提出的生态博物馆营建原则,即发展经济、改善生活、保护遗产、发扬文化,最终让山地传统村落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17]。

[参考文献]

[1] 张成渝. 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两种实践——解读生态博物馆和乡村旅游[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3): 35-44.

[2] 苏东海, 孟凡行, 方李莉, 等. 生态博物馆建设与民族文化发展——以梭戛生态博物馆为中心的讨论[J]. 原生态民族学刊, 2017(4): 128-140.

[3] [美] 乔治·亨利·里维埃. 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义[J]. 中国博物馆, 1986(4): 75.

[4] 赵孙晓. 基于生态博物馆理念的传统村落发展模式研究——以云龙县诺邓村为例[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13): 262-265.

[5] 覃代伦. 生态博物馆: 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利用的最佳模式选择——以贵州、广西生态博物馆群落为主要案例[J]. 贵州文史丛刊, 2020(3): 94-104.

[6] 潘守永. 生态博物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历时性观察与思考[J]. 中国博物馆, 2011(Z1): 24-33.

[7] 谢威. 原住民对生态博物馆发展的影响[J]. 中国国家博物馆刊, 2019(4): 129-136.

[8] 崔林. 对乡村旅游业实施生态审计的问题与对策[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4): 123-126.

[9] 欧阳国辉, 王轶. 中国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方式探讨[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4): 148-152.

[10] 阮仪三, 林林. 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2): 1-5.

[11] 孔达. 博物馆学视角下的乡村遗产展示利用[N]. 中国文物报, 2020-11-13.

[12] 肖一焱, 刘英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人力资源风险及对策研究[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92-98.

[13] 郑学森, 郭斯凡. 走向生态博物馆——苏格兰斯塔芬博物馆的启示[J]. 博物馆研究, 2019(1): 13-18.

[14] 崔海洋, 苟志宏. 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研究进展及展望[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12): 66-73.

[15] 苏东海. 建立与巩固: 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的思考[J]. 中国博物馆, 2005(3): 14-15.

[16] 何娜. 乡村振兴战略下山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规划探索——以重庆汪家寨为例[A]//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杭州市人民政府. 共享与品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8 乡村规划)[C].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杭州市人民政府: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2018: 8.

[17] 苏东海. 国际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分化与整合——博物馆研究的两条思想路线札记[J]. 东南文化, 2009(6): 9-14.